

目 录

文化·修养

关于北京话	(3)
关于转型期文化	(10)
文化性格漫谈	(15)
文化选择与中国的未来	(34)
世纪之交的华文写作	(38)
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歧义	(40)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走向选择	(49)
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54)
从修齐治平到大公无私	(58)
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62)
印度演讲中文稿	(66)
一要继续 二要发展	(69)
在国家艺术院团中青年干部研修班的讲话	(74)
赴法国等四国演讲稿	(87)
这辈子哪本书是属于自己的	(92)
人文精神与社会进步	(96)
关于科学与人文	(116)
智慧也是一种美	(120)

快乐学习	(125)
汉字与中国文化	(134)
汉字与中华文化	(139)
我的读书生活	(144)
报纸有点文艺副刊是非常可爱的	(157)
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	(161)
岳阳楼说忧乐	(175)
昆曲的青春	(184)
改善高校的人文环境	(188)
快乐学习	(192)
我对文化外交的几点理解	(208)
思想的享受	(230)
在《中国书画家》创刊座谈会上的讲话	(255)
在接受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	(257)
漫谈智慧	(258)
在首届两岸汉字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78)
《热瓦普恋歌》国家大剧院首演致词	(280)
对话与理解	(282)
充满信心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286)
政治情怀与传统文化	(291)
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问题	(29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15)
珍惜并发展新疆的多民族文化	(334)
当前文化生活的繁荣与歧义	(341)

文化·修养

关于北京话*

一九八九年初我去河南,河南洛阳的几个朋友告诉我,但我不知是不是真的,在我国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为确立什么地方的话为国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有希望候选的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河南话(中州韵)。表决时只差一两票,河南话败给了北京话。河南人可能对此感到不愉快,但我想北京话确实有它的一些优点。他的四声特别明确,抑扬顿挫,读起来有音乐感。它的语音有一种具象性,从音调里能产生一种形象。比如过去北京人说“少”——“一丢丢儿”,使你从声音里就觉得少(very very little)。说“受到驳斥”——“驳儿回来了”,像皮球撞到墙壁上反弹回来。北京的“儿”话也带来许多变化,比如“劲”和“劲儿”意思就很不一样。“没劲”是说没有趣味、很枯燥;“没劲儿”是说没有力气,很衰弱。有一本《北京口语儿话词典》收录了现在还活着的儿话七千多种,“温乎儿”“软乎儿”“面乎儿”都是儿话,有特定的含义。北京话中还有一些它独有的词,如“敢情”,第一它表示同意,第二所说的事情很浅显。比如:

“美国人可是比中国人有钱哪!”

“敢情!其实美国人有钱也舍不得花。”

*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中文培训班的演讲。

“敢情！美国人那点儿钱还真不够花。”

说很深奥的事情不说“敢情”，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问题、人权问题没有人说“敢情”，问题太复杂了，你“敢情”不了。

北京话不等同于普通话，普通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规范化的语言。有些北京土话很难懂，我也不懂。比如我们说“好(good)”，文言中有一个词“妙”，“妙哉妙哉”的妙，表达好的意思。不仅是好而且让人感觉很舒服时说“赛”，比如冬天买一个水萝卜吃，别人问味道怎么样啊？你觉得很好吃很爽口，就可以回答说“真赛”！是哪个“赛”我也不知道，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棒”也是说好，“好棒”“真棒”。这个说法在台湾还很流行，在北京已不怎么时兴了，台湾同胞替我们保存了这种说法。说人长得漂亮——“帅”。现在的北京人既不爱说“棒”，也不爱说“帅”了。六十年代初期说“份儿”，买了一件好衣服，同事们见了说“够份儿的呀”！“真份儿”！一个人很神气，别人可以说“这小子真份儿呀”！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喜欢说“盖”，那时包括一些外国留学生也都会说“真盖”“盖了帽了”。这个词现在也已经过期了。现在称赞一个东西、一件商品不说“盖”而说“潮”——赶得上潮流、新潮的意思。还有的时候说“狂”，比如说我家买了一套真皮的沙发，样式也很讲究，别人看了就说：嚟，你这个沙发真狂！“狂”的本义是crazy、mad(疯狂之义)，引申出来就是“很奇特”“好得让人发疯”。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好”也有很多变化，现在大家都喜欢说“瓷”。“瓷”以前叫“铁(iron)”——说他们的友谊像铁一样牢不可破，现在又说“瓷”。“瓷”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知道，有人写成磁铁的磁，对此我很怀疑，儿童或青年不大可能从物理学、电学的角度去创造一个词。我觉得应当是瓷实的瓷，写出来就是“瓷”，而我们的作家朋友们都喜欢写成“磁”。

想方设法讨好别人叫“套瓷”。比如两人一见面：

“你是哪儿人哪?”

“我是河南人。”

“我也是河南人哪!咱们是老乡啊。”

“你在哪儿读书?”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我住过两个星期呀!海·瑞顿就是我的朋友啊!你认识海·瑞顿吗?”

“不认识。”

“你认识谁呀?噢,你认识利克·白瑞,利克·白瑞我也很熟呀!利克·白瑞不就是白瑞·利克的弟弟吗?”

这叫“套瓷”,用话与别人拉近乎。

我小的时候,小女孩对别人不满意爱说“德行”。德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your manner is too bad(行为不好)。如果男孩子对女孩子说一些不礼貌的话,女孩子就说“德行”“德行样儿”,表示她们对男孩子们的话连同说话的形象都不满意。她们还爱说“讨厌”,男孩子经常被骂“讨厌”,就编出歌谣来把骂幽默化——“讨厌鬼儿,喝凉水儿,砸倒的冰,卖汽水儿!”这与当时冷饮的状况也有关系,最普遍的饮料是汽水,现在要编可能是“砸倒的冰,卖可口可乐”了。当时一般还没有冰箱,用冰块儿冰汽水儿,所以是“砸倒的冰”。男孩子念这样一套咒语脸就不红了。两个女孩子互相骂“德行”也很好玩儿:

“德行!”

“你德行!”

“瞧你那德行样儿!”

“你德行好!”

两人就互相“德行”起来了。“散德行”是“出丑”的意思,比如一个人很喜欢吹牛,他明明不懂的东西却到处乱吹,就像穿上了一件

很难看的衣服还要招摇过市一样,我们就说他“散德行”。

现在的女孩儿都不怎么说“德行”了。我现在与女孩子接触不多,但我知道她们对别人不满意的时候喜欢说“你有病啊”。“你有病啊”这句话完全不具有医学上的意义,没有对他人的健康表示关心的意思,没有 are you ill(你病了吗)的意思,是说他的做法也是很“德行”的,令人讨厌的。

这些都反映了北京话中一些词语的变迁,变化较大的是关于“聊天(talk)”的说法。中国人是很喜欢聊天的,相互之间要说很多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比美国人多些?就我所看到的,美国人在地铁里、电车、汽车上很少说话,多是安静地坐着,或拿一张报纸看。前苏联人则不单是看报纸,还捧着很厚的长篇小说看,有人给我解释说这是由于莫斯科的报纸太没劲了。在我小的时候,大家喜欢说“聊”“神聊”,这里还有一个歇后语:二郎爷的鸡巴——神聊。在土话中“寮”“寮子”的意思是 sex organ(性器官),与“聊”同音,二郎爷是神,所以二郎爷的××就是神聊(寮)。这个话已经有了倾向,就是他说的话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是二郎爷的性器官一类的东西,不要太认真,当成很可靠很可信的话。中国关于聊天的说法非常丰富,中国西北地区把聊天叫“编”“编闲传”。北京人聊天还叫“抡”“胡抡”,非常形象,是说他的话着三不着两,不着边际,不可靠不可信。由“抡”现在又变成了“砍”“砍大山”,一般人写“砍大山”写了一个很文雅的字,即“侃”,侃侃而谈的侃。侃侃而谈是指滔滔不绝,很有学问和风度的谈话,所以我不相信是这个“侃”字,就像我不相信“瓷”是电磁的“磁”一样。年轻人最初说“砍”,肯定不是从侃侃而谈出发的,它比“抡”还要厉害,像用斧头、用刀砍一样,这才是形象的、通俗的。

中国在政治上有一个口号叫做“向前看”,意思是不要老想着那些历史上的麻烦。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不是日本人首先发明出来的,因为中国与日本在探讨两国关系的时候,日本人特别强调向前

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只认钱的不好的倾向,人们称之为“向钱看”。“向钱看”与“向前看”的读音相同,一个老作家提出把“向钱看”读成“向钱儿看”,以与“向前看”相区别,因为“钱”有儿音,而“前”没有。“前门”不能读成“前儿门”,“前门儿”也不行,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意思变了,“前门儿”不再指北京城的正阳门,而是指一个很具体的门。这是北京儿话的妙用。

另外,还有“早班”和“早班儿”的例子。“早班”“晚班”是说上班时间的不同,而“早班儿”没有这个含义,它是起得早、来得早的意思。

在我很小的时候,孩子们嘲笑美国兵叫“三轮儿车”。当时我们都是反对美国兵的,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北京、在中国其他各地有许多美国兵,他们叫三轮儿车——“三轮!”让人听了觉得特别好笑。你只能叫“三轮儿”,而不能叫“三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同学们上街要是想坐,你要叫“三轮儿”,不能叫“三轮”,不过现在坐三轮儿比 taxi 还要贵,最好不叫。

“小说”和“小说儿”。比如有人问我,王蒙你最近在干什么呀?我说我刚写完一部“小说儿”,而不说刚写完一部“小说”。“小说”就太认真了。

我女儿常拿我太太开玩笑,因为我太太常有忽然不用儿话的时候。比如要吃晚饭了,我太太常喜欢说要落实“人头”,“人头儿”就是 number(多少人)。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结了婚,如果都来的话,人数就会很多,不来人就很少,就我太太和我两个人。但她常常不愿意说“人头儿”而说“人头”,但“人头”就很可怕。

北京有开“片儿会”的说法,由某一地区的人参加的会议,这个地区有多大很难确定。这样的会议你不能叫“片会”,“片”和“骗”同音,弄不好理解成“骗会”就麻烦了,成了 lie meeting(说瞎话的会)了。

“篇”和“篇儿”。一“篇”指整篇文章;一“篇儿”指 one page(一

页),也是不一样的。

北京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轻声。“我们”“早晨”“妹妹”的第二个字读轻声,读重了就成了港台和新加坡的中文了。所以会不会使用轻声是判断他是不是 original Beijinger(北京人)的一个标准。中国人管外祖母叫“姥姥”,第二个字也必须轻读,如果你说这是我姥姥(轻),人家能懂;要说这是我姥姥(重),人家就糊涂了。“姥姥(重)”还有一个意思——根本不可能(it's impossible)。“别价”也是轻声,用在比较亲热、比较轻松地劝阻别人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要与他老婆离婚,我一定会说“别价呀”,它与郑重的反对和阻止有所不同。又如大家在这里听我讲,觉得没意思了,七八个人站起来要走,我连忙说“别价,别价,我这就完,请你们再耐心坐两分钟”。

关于“死”北京话中也有很多说法。可能是由于大家都不喜欢 dead(死),所以就用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过去了(pass a way)”,这与英语中表达死的说法完全一样。“走了”“老了”“没了”这都是很普通的关于死的说法。还有些不太好听的——“吹灯了”“吹灯拔蜡了”。还有更好玩儿的——“听蚰蚰儿叫去了”。蚰蚰儿就是蟋蟀,坟地里蟋蟀很多,死人有更多的机会听蚰蚰儿叫唤。还有“喂儿屁了”“喂儿屁着凉了”“喂儿屁着凉大海棠了”。大海棠,我想它没有实在意义,就是为了押韵,但你不能说它没有任何意义,它显示着说话人对死者的态度或说话者的性格。

“缺德”。“缺德”就比“德行”更严重了,尽干坏事没有道德,说一个人非常缺德叫“缺德带冒烟儿”。“冒烟儿”与缺德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缺德带冒烟儿”显然比“缺德”还要厉害得多。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句话——这小子“缺德带冒烟儿,生孩子都不长屁股眼儿”。为什么要这么想我也不知道,他太缺德了,所以他的孩子生下来是没有肛门的。可为什么不说“不长鼻子”“不长眼睛”“不长耳朵”呢?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可能是受英语的影响,港台的小姐讲话声音高高低低连绵不断。我去年十二月到过台湾,台湾华视对我进行现场采访,采访开始前播音小姐正在报告新闻,我注意到她的讲话就是这样,完全是英语式的语流。而大陆、北京的中文发声方法不是这样的,词与词之间是有停顿的,略略有一点儿中断。我这样讲希望不致引起台湾小姐的不愉快,其实我很喜欢听港台小姐讲话。讲中文我的感觉是某个词有时略高有时略低,有时略重有时略轻,不把语气表现在语流的升降上。

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北京话也引入了一些新词,特别是从香港和广东。比如给吃饭付账叫“买单”。北京一部分人还对广东话香港话进行了创造,香港有“茶包(tea bag)”的说法,北京人就把“茶包”与“trouble(麻烦)”联系起来,说这个人是个“大茶包”——trouble maker(制造麻烦的人)。中文中有很多外来语是大家所熟知的,如“坦克”“沙发”“逻辑”等等。除从英语外,还有从阿拉伯语引进的,这是回民朋友告诉我的。北京人说一个人心地不好——他“泥胎”不好,“泥胎”就是阿拉伯语“尼亚特”,含有动机、目的之意。“泥胎”不好就是心地不善良。北京话中还有波斯语,香菜也叫“芫荽”,它来自波斯,波斯语叫 yumhaket,“芫荽”两字在中文里没有别的用途,就是为称呼这种来自波斯的蔬菜而创造的。“菠菜”也是从波斯语“波来特”而来,最初叫“菠棱菜”。还有满语、蒙古语,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京话还有一些歇后语,有些歇后语是全国到处都有的,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面子,等等。还有一些很有北京人的特色,如狗掀帘子——全仗着嘴,用于嘲笑那些光说不练,说空话大话的人。还有吃铁丝拉策篱——自编,死孩子放屁——有缓,这都是带有京油子味道的歇后语。

另外,北京话里还有绕口令,比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等等。

1994年6月28日

关于转型期文化*

这个会议,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东方艺术》杂志正在努力把自己办成高品位、高质量的刊物,也看到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各界人士对刊物的重视、支持。因为我知道,现在办刊物是很寂寞的,不太可能造成热烈的氛围,但《东方艺术》的努力说明河南的文化界、文化人正在励精图治,希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文化上有自己的表现。

《东方艺术》这个题目下面可以有一些当代人们最关心的文化热点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在这个刊物上来进行探讨。

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它又面临着新的机会和机遇,诸多的此类问题,都可在刊物上有所反映。刊物也因此会办得更引人注目。

首先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交流和汇合的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全球一体化的问题,抑或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全球性的文化前景是怎样的,不少人对此已很关注。

其次是关于东方美学问题。我个人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缺少自己的美学体系,甚至使整个东方美学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及早期的左翼运动,接受的是苏联的和俄国的别

* 本文是作者在《东方艺术》杂志恳谈会的讲话。

(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那一套文艺理论。那一套语言系统、那一套符号系统,长期以来被我们所运用。它们基本上是用反映论来解释文艺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最核心的概念是典型,是人物,是题材,是主题,是生活,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等等。这些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启迪是非常之大、非常重要的,我丝毫没有否定的意思。但是,我们中国的理论,中国的美学,包括中国的绘画、戏曲、书法理论,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我们似乎是更重在“表现”,讲的是诗言志,讲的是寄托情致,实际上画什么东西、再现什么并不是最主要的,以这些东西为载体来表达他们的情感那是更重要的,等等。中国的这套美学缺少系统性,但它非常灵活,不拘一格,它很容易与其他美学体系接轨,很容易与任何一种新的美学理论接轨,这种接轨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东西。

刚才讲的别、车、杜和前苏联的一套语码系统,我们曾长期予以膜拜,现在则又完全换成了西方的一套语码系统,没完没了地用西方的一套语言、观念来解释中国的艺术现象——现代还是后现代、感觉还是知觉、新闻主义还是新新闻主义,等等。对于上述的种种问题,可以不可以有所发展,可不可以有所突破,可不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思路来讨论东方的艺术现象,我们实在面临着很多课题。对此,我们不能不重视。

比如,中国戏曲的发展,从国家领导到文化主管部门来说,态度都是积极的,都非常重视扶持和提倡戏曲。振兴京剧、振兴昆曲的活动,文化部每年都拨很多钱。陈云同志最关心曲艺,亲自担任苏州评弹学校的名誉校长,这是全国级别最高的校长。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戏曲的观众在一天天减少,大量戏曲演员转向通俗歌曲的演唱。有一次中央电视台介绍的一批歌星,几乎都是从戏曲演员转行过来的,其中有唱黄梅戏的,还有一个是程派艺术的高手。这种景象让人看着觉得心情非常复杂,而且用行政命令也好,发文件也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外,还有中国画的前途、走向,

及中国音乐、中国民乐的前途、走向等等,牵动了许多人的心。我个人不是消亡论者,但有许多问题需要证实。

一些外来的艺术形式,在这个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型期,它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说对话剧和电影、电视和电视剧,这种人们关心的而且又莫衷一是的问题非常之多,正是写文章的好时候。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刊物上应该反映这些内容。

如果讲艺术,范围就更广泛。比如说建筑,建筑是城市的风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面貌变化非常快,特别是北京、上海。五年前我来过郑州,今昔比较,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建筑风格问题、民族传统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以北京来说,我经常接触的一些外国人士和海外朋友,在赞叹北京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也流露出些许遗憾,就是觉得北京不像北京了,比如说在某个区、在国贸大厦旁边、在电视塔旁边,一抬头看到那些房子,以为置身于香港。诸如此类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心的。

通俗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阵地。我觉得我们这个刊物不必把自己变成通俗刊物,但是完全可以,也应该正视和面对通俗文化,报道它的情况,反映它的动态,同时也探讨它的得失。我对通俗文化是最不抱偏见的,但是值得争论的问题也很多。就拿卡拉 OK 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是否定它的,而欧美一些国家就没有卡拉 OK,因为他们是非常讲究音乐的民族,特别是讲究声乐。有人说这与和他们的生理、身体构造有关系,有人说在意大利最容易碰到的是那种带共鸣的说话声音,非常动听,他们是运用腹腔、脑腔达到声音的完美。所以,他们认为卡拉 OK 是对音乐的一种破坏,是一种污染,是对听觉的污染,是对音乐艺术的污染。当然,我无意于在河南提倡意大利式的对卡拉 OK 的态度。我去广东时,有时朋友们拉着我去唱卡拉 OK。卡拉 OK 的问题,歌星、戏曲演员转成了歌星等问题,简单地骂一顿是绝对不行的。道理很简单,他唱戏,观众少,挣不了钱,但他一唱流行歌曲,就变得特别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原来在别的城市也调到北

京了,钱也有了,户口也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有了,他何乐而不为呢!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探讨。

对通俗的文学读物,需要有更多的研究。现在突出的问题是管理,包括“扫黄打非”。但是,更大的问题是通俗文学读物:它们基本上是一种什么态势、朝哪个方向发展,它们为什么会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这些有趣的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再比如引起争议的相声,它的讽刺和幽默大家都是赞成的,但具体到一个节目上的看法确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争论得一塌糊涂。我知道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中最难办的就是相声,成活率最低的也是相声。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青少年的美育问题。不知道河南的情况怎么样?记得解放前我上学的时候,音乐课还是教五线谱,至于我个人的识谱能力很差,那是我个人问题,但那时的音乐课是非常认真的。可是现在,我的几个孩子上完了大学,没有人认识五线谱,这是美育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满足民间美育要求的形式正在发展,种种活动在不绝如缕地出现。比如,钢琴班一个孩子一个月缴二百五十元才能去上课,而不少孩子仍然在热衷于学琴,这说明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有这个要求的。

我觉得《东方艺术》的题目非常之大,把它办得品位很高,办得很有生命力,办得热气腾腾,办得蓬蓬勃勃,办得引起各个方面的关心,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我个人认为,办刊物,特别是它最初出版的时候,领导和各界给予一些资助是完全合理的,否则,它就像机器一样没法启动。经过一段发展,经过一段努力,刊物获得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与读者的密切联系,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即使是品位很高的刊物,仍然会取得相当的成功。《读书》杂志是一个专门性很强的刊物,但它的发行量达到五万份。(按:据最新消息,一九九五年《读书》的印数将达八万份。)又诸如《家庭》《女友》这些题目都被人家

作了,像甘肃的《读者》——原来叫《读者文摘》——也有很大的发行量,它们也都经过了一个艰难、麻烦的操作过程。

河南省有一个《东方艺术》,它的存在是很重要的。河南有这么一本杂志,这也是搞艺术的人追求的一种精神的喜悦、一种精神的价值,读者还是非常重视这件事的。

所以我衷心祝愿《东方艺术》办下去,而且能够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1994年

文化性格漫谈*

我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经常是什么都说一点儿,今天我也不想专门谈文艺。原来我定了个题目叫《经验与常识》,这也是我最近一篇文章的题目,意思是说我没什么学问,只有些常识,而这些常识又是从生活经验中来的。后来我又想,干脆说说文化性格的问题,由于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近百年来的独特的处境,有些文化性格不妨予以讨论,这里面当然有好的也有坏的。

老舍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讲他的家乡流传的一个故事: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瓷器,特别漂亮,特别珍贵。他的几个子女都想得到这个瓷器,但他不愿意给他们,临死前就把这个瓷器摔碎了。意思是说我不能在人间生活了,这个瓷器我让你们谁也得不到。老舍说当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日本人听的时候,日本人吃惊地瞪起眼睛,不相信能有这样的事。因为不管从哪个道理讲,从很值钱也好,从遗产也好,把瓷器摔碎都是不可理解的。

有一个日本人和我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思考。他说他最不理解的就是越王勾践的故事,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长远的目的,那样地委屈自己,受那样的侮辱,做那么多卑贱的事。他说日本人无论如何做不到,日本人喜欢的是樱花的性格,要开全都开,要谢则一两天之内全部谢光。

* 本文是作者在三联书店读书会的演讲。